

ENOUGH SAID

What's
Gone Wrong
with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说得够多了，可有几句能让人信服？

皆为戏言

新媒体时代的说话指南

[英] 马克·汤普森 (Mark Thompson) 著 李文远 魏瑞莉 译

《纽约时报》社长马克·汤普森犀利评论当代舆论环境中的无知与偏见

秦朔 知名财经媒体人
“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陈铭 新闻学博士
知名辩手、主持人

张力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前FT中文网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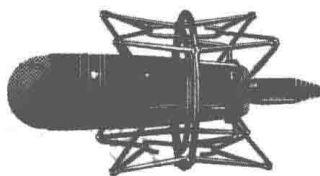
诚意
推荐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皆为戏言

新媒体时代的说话指南

[英] 马克·汤普森 (Mark Thompson) 著
李文远 魏瑞莉 译



ENOUGH SAID

What's Gone Wrong with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皆为戏言：新媒体时代的说话指南 / (英)马克·汤普森著；李文远，魏瑞莉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3

书名原文:Enough Said: What's Gone Wrong with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SBN 978-7-308-17724-5

I. ①皆… II. ①马… ②李… ③魏… III. ①语言艺术 IV. ①H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8293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7-358 号

For the Work entitled Enough Said: What's Gone Wrong with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Copyright ©Mark Thompson 2016

皆为戏言：新媒体时代的说话指南

[英]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 著
李文远 魏瑞莉 译

策 划 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杨 茜
责任校对 杨利军 牟杨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21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724-5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谨以此书献给简(Jane)

- 01 无以言表**
民怨载道 / 010
忘记了事物的本原 / 017
- 02 油腔滑调**
亚里士多德与公共言论 / 029
两种困境 / 037
- 03 又来这一套**
共识时代 / 046
不和谐之处 / 050
故技重施 / 062
- 04 公关与反公关**
好日子的坏消息 / 086
小丑与秘密警察 / 094
- 05 这个撒谎精怎么老对我撒谎？**
难以理解的偏见 / 107
啸叫 / 114
- 06 狡辩**
推特与推手 / 128
被排挤的中间派 / 134
- 07 失语后如何弥补？**
语言的特定情况 / 148
鲜血与祖国 / 155
失去的平衡 / 164



08

销售金句

你所说的前 10 个字 / 173

一些重要结论 / 177

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他们听到了什么 / 180

一个关于判断的问题 / 188

09

付之一炬

严肃、理性、公平 / 200

意义的污染 / 210

10

论战

关于借口和语境 / 234

古老的谎言 / 242

不要以我的名义 / 250

11

保持冷静但就此打住

语言和信任 / 262

语言和机构 / 275

圆滑之道的学习 / 279

特朗普测试 / 283

后记与致谢 / 291



“不要撤退，乘胜追击！”

——引用自 2010 年 3 月 23 日 莎拉·L·佩林 (Sarah L. Palin)
在推特上发表的推文¹。

公共言论事关紧要。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而无论政治家、记者还是普通市民，都可以发表公共言论。但有时候，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有这样，才能左右下一步发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同理心和口才的领导人、电视台评论员和社会活动家不仅能用言论来影响公众情绪，而且还可以塑造公众情绪。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和平、繁荣、进步、不公、偏见、迫害和战争。公共言论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可不是什么新发现。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教授和讨论公共场合下的说话之道和演讲艺术，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在当今社会，公共言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的言论在虚拟空间飞速散播，几乎没有任何延迟。政治家只要站上演讲台，就可以把自己的理念灌输给上千万人；一张带有作者名字和特定含义的图片（比如说：飞机撞上了摩天大楼）可以在瞬间被全世界的观众看到，不再受距离或机器限制。几十年前，我们都是事情发生几天后甚至几周之后才听到关于这件事的传闻或看到相关报道，而如今，我们成为事件目击者，可以实时观看或收听事件的整个发生过程。

现在，只要有公共事件发生，人们便通过各种渠道口耳相传。有人在网上



发帖,有人回帖。现在,请看着我,听我给您一一道来。

我们都觉得自己身处数字化信息时代,事实的确如此,但是,我们有时候忘记了一点:在千百年来的人类社会中,人类语言一直发挥着提醒、恐吓、解释、欺骗、激怒、鼓励和说服的作用,尤其是后者;而在信息时代,又有多少信息是以人类语言传递的呢?

这也是公共言论的时代。不仅如此,公共言论还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这当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然而,每当我们思考和讨论当代政治与媒体的现状(即政策与价值观的探讨和决策方式)时,我们往往只是顺带提及公共言论,仿佛它只是一种有趣的因素,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他更基本的东西似的。本书认为,公共言论值得我们密切关注。这里所说的“公共言论”是指我们在讨论政治和政策,在法庭上提出论据或在公共环境下尝试说服其他人所使用的语言。修辞学是对公共语言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学科,它曾被视为“人文科学之母”。如今,修辞学已经摘下了它晦涩难懂的面纱,我要让它重新坐上人文科学的王座。

我们比以前学习修辞学的学生多了一项优势。现代媒体具有可搜索性和不可消除性的特点,这意味着我们很容易就能追溯到构成某种特定演讲术的具体单词和语句的演变过程。就像流行病学家追踪某种新型病毒一样,我们可以让时间反转,追溯某段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言论的起源。首先,我们要找到它的“流行期”,也就是该公共言论是何时开始流行、何时变得朗朗上口、何时出现在家家户户电视屏幕上的;然后,我们继续往回追溯它的晚期和早期发展过程,并最终找到它诞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



2009年7月16日,纽约州前副州长贝齐·麦考伊(Betsy McCaughey)博士受邀来到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的电台节目,就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美国医疗系统改革计划发表观点。该医疗改革是为此前没有医疗保险的数千万美国公民提供医疗保障,它也成为当夏最热门且备受争议的政治话题。

2015年秋去世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汤普森一生过得多姿多彩。生前的

汤普森满脸皱纹、下颚宽厚，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他曾是一位有名的律师，后来进入美国参议院当议员，并利用业余时间好莱坞成功参演过几部电影，堪称性格演员。从参议院退休后，他开始主持电台脱口秀节目。2009年，他的节目成为保守派人士剖析和指责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无数渠道之一。

没有谁比贝齐·麦考伊更适合抨击奥巴马医改计划。麦考伊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而在英语中，“博士”和“医生”的缩写同为 Dr.，这让听众感觉麦考伊是一名医学专家。麦考伊出生在匹兹堡，幼年时家境贫困。她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成为美国右翼一位举足轻重的公众人物。她被公认为美国医疗政策领域的专家。20世纪90年代，以民主党人为首的克林顿政府曾尝试过改革美国医保体制，史称“克林顿医改计划”，但该计划却以失败告终，而麦考伊当时正是克林顿医改计划的强烈抨击者。当然了，与克林顿医改计划相比，奥巴马医改计划的主张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一些基本原则是由共和党人提出甚至实施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医改计划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所进行的医保改革政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他的不利之处。在麦考伊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罗姆尼已经被吹捧为2012年接替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职务的潜在候选人之一。

但是，贝齐·麦考伊为人太过直率且非常执着。她知道，奥巴马医改计划与克林顿医改计划实属一脉相承，这让她极为不爽。电台主持人汤普森是不太可能在节目中用刁钻的问题为难麦考伊的。在巴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前，美国政治早就已经两极化，而媒体对于政治的讨论也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这种荒谬局面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支持任何一个党派的演播室或政治主体网站都会抱团发声，任何与其意见相左的人都不会出现在该演播室或网站中——实际上，那些持反对意见者很可能躲在另一间演播室里，同样把自己裹在由另一种意识形态打造的温暖舒适的“茧”里，这样，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就不会受到别人的反驳。

从表面上看，汤普森所主持的7月16日这期节目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包括政治背景、出场人物、可能出现的争论氛围和过程等。但在直播这天，贝齐·麦考伊却语出惊人。在对当时正在美国国会接受审核的奥巴马医改计划立法草案进行深入剖析之后，麦考伊声称她偶然发现了一份此前不为人所知但却非常令人担忧的提案：



在这份法案中,我发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观点,其中一点出现在第425页,即国会将强制要求……每隔5年,参与医疗保险的民众,必须参加辅导会议。该辅导会将告诉他们如何更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何减少营养补给,如何拒绝摄入水分,如何参与临终关怀……这些问题事关生死,神圣无比,政府不应该牵扯进来。²

这段话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首先,麦考伊的说法是错误的。她所引用的法案内容出现在第1233节,这段内容其实并没有强制民众参加“终结生命”辅导会议。是否参加这种会议,将完全取决于患者自身的意愿。建立联邦老年保健医疗制度的初衷是让为数众多的美国老年人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而这份草案的目的是赋予这些老年人自愿参与辅导会议的资格。

虽然这个错误的说法立即被法案的支持者驳得体无完肤,但它还是被迅速传播开来,而这正是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是更有趣的一点。此前,“终结生命”辅导会议条款曾暂时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但在麦考伊发表言论之后的几天里,美国许多颇具影响力的保守派电视和电台评论员以及共和党很多政界要员开始接受这个说法,而时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的约翰·博纳(John Boehner)也赞成此观点。人们开始热议这件事情。电台主持人兼保守派人士劳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引用她83岁老父亲的话说:“我可不想让官僚告诉他:你必须接受这样那样的治疗,否则的话,你就不是好市民。这简直太可怕了。”³一些带有右翼倾向的电台评论员调侃说,第1233节内容是“纯属虚构”或“恶作剧”;而电视主持人乔·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则直接在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的《早安乔》(Morning Joe)节目中取笑这节内容,称其简直就是“‘死神’条款”。⁴保守派认为,麦考伊关于该法案的说法并非虚构,而是在陈述事实,他们内部对这一政治分歧的绝大多数讨论都是以此为前提的。

随后,莎拉·佩林(Sarah Palin)8月7日在脸书(Facebook)上发布的一段话让她卷入了这场纷争。其内容如下:

我的父母或患有唐氏综合征(Down's Syndrome)的孩子将来要站在奥巴马的“死亡委员会”面前,让他的官僚根据我亲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他们进行主观评判,然后决定他们是否够资格享受医疗服务。这种

制度是极其邪恶的。我所熟知和热爱的美国不应该变成这样。⁵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几天后,新鲜出炉的词语“死亡委员会”传遍了大街小巷,并出现在广播电台、电视、报纸、网络(包括推特)上。传播它的不仅是佩林和她的支持者,还有那些拼命想驳斥这个说法的人,这个结果虽然出乎人们意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到了8月中旬,由皮尤(Pew)研究中心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至少86%的美国人听说过这个词;而在这部分人当中,有30%的人相信奥巴马真的提议组建“死亡委员会”(其中,47%的共和党人持这一观点),还有20%的人不确定是否确有其事。⁶

尽管“死亡委员会”这个说法不断被否认,但还是有很多人固执地认为奥巴马医改计划意味着人们必须要面对“死亡委员会”的审核。几个月后,民主党人终止了这份潜在提案。2012年,奥巴马政府再次提议将“终结生命”辅导服务纳入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死亡委员会”这一说法又有死灰复燃的苗头,该提案再次被迅速终止。2015年夏,在进行深入研究和广泛咨询之后,奥巴马政府宣布: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将为参加“终结生命”辅导会议的人士支付相关费用。不出所料,贝齐·麦考伊马上在《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上刊文称:“‘死亡委员会’又回来了。”⁷

就是这样一个本身带有谬误的词语,夸大和扭曲了一项主张,并改变了美国的政治进程;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没有真正戳中奥巴马医改计划的重点。事实上,很多美国人在回想起医改计划的整个纷争过程时,可能只记住了“死亡委员会”这个词语。谈起莎拉·佩林,善于挑动政治争端的资深保守派政治家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是这样说的:“这位女士知道如何制造话题。”^{8,9}



无论我们对这场政治闹剧的主角或奥巴马医改计划持何种看法,或者怎样看待美国的医疗改革和政治,且让我们暂时把自己的观点搁置一边,从纯粹的修辞角度思考“死亡委员会”一词。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论?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美国的公共言论到底经历了什么?

显然,浓缩性是“死亡委员会”这个词语的部分优势所在。它虽然只有简



短的五个字，但却表达出了强有力的政治观点，非常适合在推特和其他媒体上使用。假设现在是2009年夏季的某一天，你正在美国的一个机场里走着，突然看到“死亡委员会”一词工工整整地出现在机场电视屏幕正下方（所有有线电视新闻网都这样干）。你甚至都不知道电视上正在侃侃而谈的那个人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奥巴马医改计划，你所看到的和记住的就是“死亡委员会”这五个字。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浓缩性。这个词能够产生提喻法的效果，即以部分代喻整体。当我们听到“死亡委员会”这个词时，我们就知道它不仅代表着奥巴马医改法案的第1233节内容，还代表着整个奥巴马医改计划。其实，它还代表着与巴拉克·奥巴马本人、奥巴马政府以及奥巴马对美国未来的展望。

该词还运用了预期叙述法，它把一个想象中的未来场景以现实的方式呈现出来。与贝齐·麦考伊只是歪曲奥巴马医改草案的做法相比，莎拉·佩林大胆做出了这样一个政治预测：民主党人提出的这项法案将会使你和家人的健康完全操控在联邦政府手里；由此推断，政府迟早会建立一个能够掌握民众生杀大权的官僚机构。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滑坡理论”，即如果让联邦政府通过这项法案，那么，政府将对国民的生死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但是，这当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论点，而是一种带夸张色彩的修辞手法，它直接得出一种反乌托邦式的结束状态，并以生动的画面使这种结束状态变得栩栩如生。预期叙述法威力巨大，它甚至能让你注意不到辩论的中间步骤。

在推特发表的帖子里，莎拉·佩林做了两次手脚，从而强化了“死亡委员会”一词的影响力。首先，佩林用双引号把“死亡委员会”括起来，让读者觉得该词引用自医改草案；其次，她还给“社会生产力水平”打上了双引号，仿佛这也是巴拉克·奥巴马亲口说过的话，而不是她捏造出来的。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奥巴马政府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去人性化的官僚国家。一直以来，莎拉的同事，同为保守派的众议院女议员米歇尔·巴克曼（Michele Bachmann）也对全民医保制度的狂热拥护者、生物伦理学家伊齐基尔·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的观点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解读，这似乎是促使佩林发表这番言论的原因。然而，保守派对于美国政府医改尝试的攻击早已有之。在半个多世纪前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医学会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把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全民医保计划形容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医疗制度”。但是，“死亡委员会”一词让人联想起更阴暗的寓意：发生在20世纪的人种改良和安乐死计划以及死亡集中营里的生死抉择；只不过，巴拉克·奥巴马和他的老年医保官员取代了纳粹军医的位置。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倾听的话，还是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佩林刚开始的话还相对温和，她只是说政府要督促老年人拒绝接受进一步治疗；后来，她又在帖子里提到了她的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崔格·佩林(Trig Palin)，声称政府正在谋杀年轻人，这表明佩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问题扩大化和严重化了。

佩林的话还有更深层含义。美国选民一般认为公共政策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问题涉及宗教、文化和伦理的核心差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流产和同性婚姻的争议；第二类问题基本上与国家管理有关。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于莱曼兄弟公司(Lehmann Brothers)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我们如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寨卡病毒袭击美国？也许你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医保改革这种问题恰好属于第二类。

莎拉·佩林却并不这样认为。在此之前，佩林就曾在公开场合提到过崔格，当时她是为了反对流产。而为了反对奥巴马医改计划，她再次提出类似论点，宣称这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提到患唐氏综合症的崔格时，她试图将发自内心的、带有摩尼教色彩的反堕胎观点转变为围绕着医保改革的战斗。在堕胎问题上，正反双方都认为没有妥协的余地。莎拉·佩林认为医保改革问题也同样如此。她说，对那些想屠杀她孩子的人，她是不会妥协的。

而这正是我要阐述的最后一个观点。“死亡委员会”是一种极限化用语，它处处在用最强烈的语气来表述状况。按莎拉·佩林的说法，她所揭露的事情不亚于一场有预谋的谋杀。对敌手进行善意推定这种做法早已过时了，政治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这样的斗争中，使用任何语言武器都是公平的。这种含沙射影的修辞手法并不是为了消除民众对政治家的不信任感，而是为了挑起事端。莎拉·佩林的做法非常有效。

也许你认为“死亡委员会”一词有点冷酷无情，也许你觉得这种别出心裁的修辞手法荒诞可笑，而且你会为有些人被如此粗俗和过分的词语所欺骗而



感到惊讶,但你要知道,所有的修辞手法都是为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点,尤其是为特定受众设计的,它是一种极其讲究策略的、与上下文语境相关的艺术。“死亡委员会”可能不是为你而设置的,可对于那些适用人群来说,该词具有毁灭性的效果,它就像一枚精确制导的炮弹,在击穿所有障碍物之后准确命中目标。

然而,从某方面来说,佩林使用“死亡委员会”一词纯属败笔。要知道,在医保问题争端面前,各方都要做出很多现实而困难的抉择和取舍。而这种说法过于片面,过于脱离现实,而且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和意图。因此,它不但没有让奥巴马医改计划的真实政策取向变得更容易理解,反而加深了理解难度。佩林是否有意为之,我们无从得知;但为了达到修辞效果,她已经顾不上解释奥巴马医改计划的内涵了。

民怨载道

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各政治派别都承认:无论是我们的政治,还是我们讨论和决定政治问题的方式,都已经背离了正道。柏拉图(Plato)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曾说过,民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人们对民主现状的不安古已有之。但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不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016年3月15日,美国著名房地产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共和党又拿下四个州的初选胜利果实时对他的追随者说道:“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民怨载道了,相信我,真的是民怨载道。”无论你怎么看待特朗普,他所说的这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爱德曼信任度调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是一家专门评估民众对世界28个国家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信任度的机构。其2016年的调查报告表明,在经历金融危机的低谷之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提升;但报告还指出,对政治机构和其他机构,精英阶层(或称“知情民众”^①)所表现出的信任度与普通民众所表现出的信任度差距每年都

^① 根据爱德曼的标准,“知情民众”是指年龄在25岁到64岁之间、接受过大学教育、家庭收入排在同年龄段前25%、能够接触到相当数量常规消息和行业消息的人群。——作者注

在扩大,而这种差距在 2016 年达到了顶峰。在过去 4 年里,阶级信任度差距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法国、英国和美国。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民众对本国主流政治家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因为这些政治家既不能解决收入不均问题,又无法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惩治始作俑者,还使民众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的焦虑感与日俱增,并留下了伊拉克战争这个烂摊子。民众希望的幻灭有增无减,并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形成一股不利趋势,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治已经变成谩骂,左派和右派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不仅出现在政治家中间,也出现在民众中间;而主流政党愿意或能够与其对手达成和解的政策领域数量已经大幅缩减,美国更是接近于零。结果,许多全国性和由若干国家组成的政治机构的决策过程变得无比僵化。

由于对著名政治家缺乏信任,大部分民众只能对他们敬而远之,寻找他们的替代者。此类政治家既有像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样的老牌左翼激进分子;也有像法国国民阵线(French Front National)这种反移民极右翼政党,该党在近年的大选中获得相当多的票数,其党魁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 2017 年的总统选举中似乎是一位不可轻视的竞争者;还有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PO),其总统候选人诺伯特·霍弗尔(Norbert Hofer)在 2016 年 5 月份的总统选举中差一点获胜;此外,还有类似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这样的民粹激进集团、类似英国独立党(UKIP)和苏格兰民族党(SNP)这种关注单一问题的政党以及诸如意大利的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或唐纳德·特朗普这种纯粹的反传统政治家。这些非主流政党和个人在政坛上都取得了成功,一些主流政治家受此诱惑,开始模仿他们的风格和策略。最近的例子便是泰德·克鲁兹(Ted Cruz)和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虽然他们各自行事方式不同,但都在模仿上述非主流政治家的手法。结果,那些名声显赫的政党和已有的政治制度从内到外都受到了破坏。

党派分歧和民粹主义者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更加严重,那就是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且很少参与政治事务。很多民主国家选民的投票率正呈下降趋势,年轻选民尤其如此。在 2014 年美国中期选举